

改革開放30年

習仲勳

最先建議設特區



人物篇
改革開放30年

三十而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回首30年前躊躇走向世界時邁出的第一步探索——經濟特區，我們無法忘懷特區的倡立者——習仲勳。有中共黨史學者稱其為「向中央建議設立經濟特區的第一人」，並冠以改革開放初期著名改革派大將的稱號。
本報記者 茅杰



▲1978年8月5日，習仲勳（左三）在惠陽地區調查研究

【習仲勳簡介】

習仲勳（1913—2002），陝西省富平縣人，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8年4月後，習仲勳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1980年12月，習仲勳離開廣東調中央工作。



▲1980年習仲勳（左三）到深圳視察時，與深圳第一任市委書記張勳甫（左）等合影，左四為習仲勳夫人齊心。

老牛自知夕陽晚

「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曾經擔任習仲勳秘書長達20年的張志功，這樣評價老首長在廣東工作的歲月。在他看來，主政廣東的習仲勳就像一頭秦川老黃牛那樣，一天也沒有輕閒過，耕耘不止，奮鬥不息。

說起習仲勳對廣東的深厚感情，許多人還清晰記得他首次亮相黨代會的發言：北方的水土養育了我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我的下半輩子。晚年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職務上退下來之後，習仲勳果然長期在廣東居住，實踐了他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的諾言。

習仲勳的夫人齊心在《我與習仲勳風雨相伴55個春秋》一文中回憶：1978年盛夏，最怕熱的仲勳竟頂着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我心裡明白，仲勳是在拼命。張志功也會撰文：緊迫感和歷史使命感使他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緊張到甚至早晨坐在馬桶上、晚間躺在浴缸裡也看文件。

20世紀80年代末退出政壇後，習仲勳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晚年似乎只有兩次，一次是建國五十年，另一次是在深圳特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習仲勳晚年長期居住在珠海和深圳，始終關心着特區的建設和發展，直到因病住院前夕，他還讓身邊工作人員驅車帶他察看特區建設新貌。而每年新春，深圳市民都會從報上看到習仲勳寫給深圳人民的慰問信，以及那獨具一格的簽名。

習仲勳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主政廣東，前後不足千日，卻以其遠見卓識、為民情懷和高明手法，為廣東先走一步，做了大量的開拓和奠基工作。到他調任中央時，廣東改革開放的各項工作部署已逐步展開，深圳等特區建設也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局。

1978年5月，國務院派出的一个赴港澳經濟考察組回到廣州，向習仲勳、劉田夫等廣東省黨政領導介紹港澳情況後，引起廣東極大震動。之後不久，習仲勳到「中英街」的實地考察，更有了切身感受。

回到省委後，習仲勳便召集一班人研究論證並得出結論：根本出路是向中央提出放權，給廣東「先行一步」的政策。以習仲勳為首的廣東省委，開始抓緊一切機會游說，要求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希望中央同意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根據省情搞建設

不妨看看廣東在這期間為此所做的努力：

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在發言中表達了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的願望。比如，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習仲勳又做了題為《廣東的建設如何大幹快上》的工作匯報。

1979年年初，習仲勳等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匯報了如何充分利用外資和現有的條件，搞補償貿易，搞加工，搞合作經營及廣東先行一步的意見，葉帥聽了十分高興，並建議廣東儘快向鄧小平匯報。

1979年4月，習仲勳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直言：「不僅經濟體制、整個行政體制上也要考慮改革。中國這麼大，應根據省的特點來搞。」

這以後，習仲勳又不失時機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匯報並得到了常委們的支持。為了說服中央放權，為了廣東的改革開放，以敢言著稱的習老甚至放言：如果廣東有更多自主權，可能幾年就上去了，就超過香港了。二十年後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習仲勳仍激動地回憶了這番情景。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習仲勳向鄧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權力，讓廣東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有較多的自主權和機動餘地；允許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屬於重要僑鄉的汕頭，各劃出一塊地，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鄧小平非常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

設計。鄧小平敏銳地看到了這種做法是一種新思路，是中國實施開放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當他聽說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大家意見不一致時，鄧小平深思熟慮地說：「還是叫特區好，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

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發了「中發[1979]50號文件」，明確規定：「出口特區」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從此，經濟特區建設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香港行廣東也行

到廣東履新後，習仲勳遇到的第一件棘手事就是當地發生的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風潮。僅一九七九年前五個月，全省成功偷渡外逃人數近三萬人。

若問為何有此風潮，不妨看看以下數據。1978年，深圳農民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年收入卻是13000港幣！邊防地區流傳「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過來）。在習仲勳的領導下，廣東採取了標本兼治、以治本為主的方針，妥善解決了「偷渡外逃」這一重大而複雜的突發性事件，受到中央和海外輿論好評。

要留住蠢蠢欲動的偷渡心，靠什麼？必須靠經濟的發展！為此，習仲勳首先給廣東人打了一劑強心針：香港人80%以上是廣東人，為什麼香港能把經濟搞好而廣東卻不行？

1979年歲末，習仲勳率團對香港進行了為期六天的考察。在港期間，為抓緊時間學習，習仲勳甚至清晨五點半就帶大家參觀九龍長沙灣果菜、塘魚批發市場。次年，習仲勳又讓省委常委兼秘書長楊應彬帶領副省長、地委書記等再次赴港。

習仲勳此行的最大收穫，則是零距離表達了廣東對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決心，贏得了香港朋友的回應。當時，廣東改革開放正值起步階段，一些投資者對於投資環境還持懷疑態度。習仲勳表明廣東在穩定政策、改善投資環境方面的決心，消除了投資者的顧慮。

習仲勳主政廣東時間雖不長，但為粵港合作交流作出的貢獻卻不少：1978年10月，粵港達成增加供水協議，正式開通了廣州至香港的客運班機和飛翔航線，1979年4月，港穗直通客車恢復行駛，粵港政府間交往也從此開始。當月，中國第一家中外合作項目——白天鵝賓館的協議正式簽約……



▲習仲勳（左）和霍英東在中山縣建築工地視察

改革金句

■「三要」「三不要」：
要有決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
要有膽識，勇挑重擔，不要怕犯錯誤，怕擔風險；
要有務實精神，謙虛謹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風頭，不要怕否定自己。

■改革開放，如果我們廣東不提，中央也會提出來。

■現在不是搞不搞的問題，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大搞、快搞，不能小腳女人走路。

■改革要有點孫悟空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



▲習仲勳倡導幹部要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圖為他和省委領導出行共乘麵包車

小故事

空調器送會議室

1978年4月習仲勳到廣東任省委書記時，特別不適應酷暑，到了夏天，熱得大汗淋漓。那時省委只有常委會議室有空調，習仲勳的辦公室及住處只有風扇，酷熱難熬。

澳門知名愛國人士、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見此情景，就好心主動給廣東省委送了3台空調器，指名分給習仲勳一台。省委接待處通知習仲勳的秘書去取回後，誰知習仲勳堅決不同意接受，當即原封不動地送回省委接待處，裝到省委會議室讓大家享受。

訪港不買大家電

七十年代末，按當時政策，出國人員每人可免稅帶一大件家用電器如彩電、電冰箱等，因為價格比內地便宜很多，那時大家競相採購。但1979年12月，習仲勳率團訪問香港時候，他定了一條紀律，明確要求大家回去時帶頭不買不帶任何大件家用電器，同行的團員們都很自覺遵守，以致從香港乘火車到廣州車站下車時，迎接代表團歸來的鐵路工作人員發現代表團13人竟然沒有一件大件家電時，都很驚奇。

婉拒半個「白天鵝」

「白天鵝」賓館籌建初期，霍英東想向廣東捐贈半個白天鵝賓館（500個房間），但習仲勳等省主要領導卻不同意。理由很簡單：這樣會使外人以為中國共產黨搞改革開放是為了「要錢」，堅持合資或合作。廣東作為改革的試驗田，雖如履薄冰，卻勇於前行。習仲勳給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寫信：霍英東先生是愛國商人，同我們商談了八次，親自奔往廣州、北京商談了五次，請「從速審批」。在各方努力下，1979年4月，合作協議正式簽署，其政治象徵意義遠遠超過了經濟意義。



▲習仲勳晚年與太太齊心在廣東休養

習仲勳獨具一格的簽名

（劉文傑攝）

1978年4月，習仲勳離京赴廣東上任時在機場與送行人員合影

